

诺贝尔经济学奖与“看不见的她”

202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美国哈佛大学经济系教授克劳迪娅·戈尔丁，因为她“增进了我们对女性劳动力市场结果的理解”。

多年来，戈尔丁的研究领域聚焦在不平等和女性劳动力的议题上。她最为大众所知的是其新作《事业与家庭：女性追求平等的百年旅程》。书中讨论了一个仿佛人人都熟知的话题——为什么女性不如男性挣得多？戈尔丁追溯了女性追求平等的百年旅程，她将20世纪初至今受过大学教育的女性群体分成了五组，深入研究了她们在事业、婚姻、子女等方面的理想抱负与现实阻碍以及代际的演变历程。

研究发现，差异发生是因为工作的“贪婪”，即工作时间不灵活，收入与工作时长呈非线性关系。而女性因为承担了更多的家庭责任，所以收入在生育后低于男性。“回归家庭”“平衡家庭和事业”，这似乎一直是女性普遍要面对的难题。什么时候开始，家务劳动变成了女性的天职？家务劳动算不算一份工作？“家庭主妇”的身份，到底给女性带来了什么？

现代快报+记者 姜斯佳

家务劳动是一项永无止境的工作

作为首批将女性的家庭事务纳入社会学研究范畴的学者，英国社会学家安·奥克利长期关注家庭事务的性别分工。在1970年首次出版的《看不见的女人：家庭事务社会学》一书中，她打破了“性别主义”的研究桎梏，开创性地将家务劳动视为工作的一种。

安·奥克利采访了40位家庭主妇，她们都已婚已育，至少有一个5岁以下的孩子，其中有6个人不是全职妈妈。奥克利根据他们对家务、育儿、婚姻、就业和生活整体的满意度进行了评估。将女性从“看不见”的家庭私人领域带入公众视野，并将女性从事家务劳动背后的种种结构性困境呈现在我们眼前。

当被问及她们对在表格上写上“家庭主妇”这一职业时的感受如何，有21位家庭主妇“会介意”，有19位家庭主妇说没发现有任何贬损之义。一位记者的妻子提到了社会成见：“我只是在需要填写表格时才会把自己当成家庭主妇。有时，我想提出一些更为有趣的观点。我认为这是一项体力粗活、女佣一类的工作——人们就是这样看待它的。”

无论她们对家庭主妇角色的个人认同感如何，贬低家务劳动，使之琐碎化，在我们文化中如此普遍和根深蒂固，以至于这种观念很可能在不经意间就以某种形式灌输给家庭主妇。随之而来的是，女性想要与家庭主妇这一职业相脱离。

关于“成为家庭主妇最棒方面”问题的回答中，奥克利采访的女性中有一半以上指出自主性是家庭主妇最看重的特质。在对“最糟糕之处”这个问题的回答中，有28个人提到家务劳动的单调乏味，另有6人描述了女性要一直对家庭和孩子持久负责的负面感受。

家务劳动被描述为一项永无止境的工作，就像那句老口号喊的“女人的工作永远做不完”。有人说做家务比有薪工作还要劳累，有些女性说做家务要付出的情感代价更大，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它不像其他工作那样费力费神。也有人提到家务劳动的非建设性，提到单调乏味的劳动给主妇带来的情绪上的厌倦、沮丧，家务需要主妇一次又一次地重复相同的动作。而來来回回做，却换来永久失败的感觉。

做家务不是单项的活动，它是各种各样的集合，这些任务需要各种技能与各种劳动参与。奥克利在书中将家务劳动分为六项：清洁、购物、做饭、洗碗、洗衣和熨烫。在这六项任务中，熨烫是最不受欢迎的，被采访的3/4主妇都持有这种消极态度。接下来按不喜欢的程度排列，依次是洗碗、清洁、打扫房屋和洗

衣服。它们和熨烫一样都涉及一系列重复动作，这些反复的动作类似工厂中的流水线工人，与无休止的重复性工作捆绑在一起。

烹饪被认为是最有趣的活动。它是一项挑战，也可以是一门艺术。但实际操作呢？时间和金钱的有限，阻碍了享受烹饪的乐趣。家庭主妇不仅是一位大厨，她还同时是洗碗机、清洁工、保姆和照看孩子的人。丈夫们要求在特定时间用餐，小孩们肚子饿时就会大哭，那些本来能够在做饭上的时间还要用来拖地或换洗床上用品。“思考吃什么”是一项永无止境的任务，无论这个任务实际上多么具有创造性。

这些家务图景与通常认为的家庭主妇是闲赋阶层的观点形成了鲜明对比。因而人们不能指责家庭主妇“整日无所事事”，同样也没有合理证据来说明她们唯一的“工作”是“富于创造性”的。

不被看见的情绪劳动

母亲节那天，我收到的礼物是一条项链，我丈夫则躲去清扫卫浴，留下我照顾三个孩子。他觉得，自己正在做我最想看到的事——给我一个干净如新的浴室。当我经过浴室，把他扔在地板上的鞋子、衬衫、袜子收好，却丝毫没有注意到他精心打扫的卫浴时，他很失望。我走进衣帽间，被一个搁在地板上的塑料储物箱绊倒——那个箱子是几天前他从高架子上拿下来的，因为里面有包装母亲节礼物所需的礼品袋和包装纸。几天下来，那个箱子被推挤、踢踹、挪移到一旁，但就是没有放回原位，变成看了就生气的导火线。“其实你只需叫它放回去就好。”他看到我为箱子心烦时这么说。这么明显的事情，他直接把箱子举起来、放回去，不是很简单吗？但他偏偏就是绕过箱子，故意忽视它两天，现在反而怪我没主动要求他把东西归位。“这正是症结所在。”我眼里泛泪，“我不希望这种事还要我开口要求。”

2017年，一篇名为《女人不是唠叨——我们只是受够了》的文章在国外社交媒体上迅速走红，短短数日被分享转发近百万次。上百万女性在文末接力留言，分享着各自的共鸣体验，她们开始意识到，真正消耗她们的根源是——情绪劳动。时隔一年，文章的作者、记者杰玛·哈特莉出版了《不被看见的情绪劳动》一书，结合她的亲身体验扩展了情绪劳动的概念边界。

对于女性而言，她们崩溃的原因在于无法描述这种情绪上的疲惫。“我是负责安排时间表的人，随时帮大家预约行程，知道行程表上有哪些待办事项，我也知道一切问题的答案。我的脑中存放着五花八门的清单，不是因为我爱记这些事情，而是因为我知道其他人都不会记。”这种接踵而至的“安排”并没有看起来那么容易，它们琐碎且需要分

配大量注意力资源，因为这些任务背后始终要考虑“该怎么做，才能让这一群人都满意”。

造成疲惫的另一个根源还在于，这些劳动中的大部分都不被看见。芙妮·杜美的《放手》讲述了生完孩子后对先生的怨怼：“他不仅做得比我少，还没意识到我做得比他多！”事实上，1965年到2015年间，父亲花在家务上的时间增加了一倍多，花在照顾孩子上的时间增加了近两倍，但女人在家务及照顾孩子上所花的时间仍是男人的两倍，其中还不包含情绪劳动。

作家乔尼·布鲁西的一篇文章也引发了热议，文中提到，如果她想请家人“帮忙”，就需要以愉悦的口吻提出恳求，即便是“帮忙”清理家人弄乱的东西。“我们把做家务视为‘帮妈妈的忙’，而不是做该做的事。”

大众普遍认为，即使男性愿意承担更多的情绪劳动，他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做。男女先天如此不同，所以追求平衡是不可能的。长久以来，男性和女性都习惯相信这种迷思，认为女性先天就是比较擅长这类事情。

宾夕法尼亚大学传播艺术与科学副教授米歇尔·拉姆齐打破了这种迷思，她指出，情绪劳动几乎百分百是后天培养的：“孩子三岁的时候，就明白性别角色，包括他们‘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孩子的理解能力比多数人所想的还要强大，而且大多数孩子从小就接触大量的媒介内容，所以他们很早就学会了性别角色。”从小到大，我们所处的文化都在持续灌输我们——情绪劳动是属于女性的领域。实际上，男性和女性生来就有类似的情绪劳动天赋，但只有一半的人在成长过程中受过这方面的训练。

与此同时，每个人都有必要改变对情绪劳动的看法。杰玛·哈特莉认为：“尽管这些情绪劳动令我们沮丧，但这种照护型的劳动本身就是一种宝贵的技能。我们熟练地顾全大局，宏观地思考结果，游刃有余地调适意外状况，用心地投入工作、培养关系、应对偶然的互动。这些技巧是确保我们细心完成精神任务及情绪任务的资产——这里的细心不只是专注在任务细节上，也专注在他人身上。情绪劳动在生活中呈现的方式，就像是以维系社会的文明细线编织成一条精致的挂毯。”理想的未来并不是要放弃情绪劳动，而是去掉情绪劳动的性别标签。

家务是无薪劳动

为何女性的任务一定就是家务、育儿和护理？什么时候开始的？究竟有什么用？……研究这些问题时，著名社会学家上野千鹤子有了许多发现。

其实，家庭主妇存在的历史并不长。现代之前，人们的住处就是生产场所。前现代的日本，农业人口占据总人口的80%左

右。农户都是全家出动的劳动集体，不论男女老幼，只要能动弹的人都要下地干活。而那些腰腿不灵便的老头老太，就得在家里照顾孩子。现代资本主义创造了雇佣劳动者，由于男性独占了这一角色，才产生了待在家里的无业主妇。她们在市场上虽是无业，但也是“要工作的女性”，因为家务也是劳动。只不过那是“看不见的劳动”，也是“无薪劳动”。

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市场其实并不是封闭的。市场并非一个封闭系统，而是开放系统。市场存在着外围，用于获得投入、排放产出。其中一种外围，就是自然。同时，市场还存在另一个外围。那个外围向市场输送劳动力，也就是人力资源，同时接收市场释放的不能再成为劳动力的人，上野千鹤子将其称为家庭。这两个外围表面上看不见，还很容易被人们遗忘。

在《父权制与资本主义》的最后一段，上野千鹤子这样写道：“为何人类孕育生命和为其送终的劳动（也称再生产劳动或照护劳动）被置于其他一切劳动的低位，这是一个根源性的问题。”只要解开了女性为何是“照护性别”之谜，绝大部分女性的问题就能得到解答。

提出“家务乃是无薪劳动”之后，有一批人最先跳起来反对这个概念，那就是现役的家庭主妇。她们坚称：“我做的事都是出于爱，那是无价的行为，不能简单换算成金钱。”事实上，定义一种行为是否属于劳动，有一个很简单的“第三方评价标准”，能够转移给第三方的活动就是劳动。如此一来，大部分家务都是劳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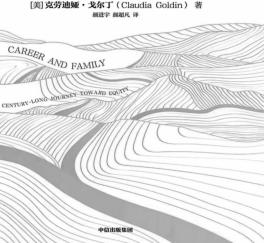
应1995年举办的北京世界妇女大会要求，1996年，日本经济企划厅（现内阁府）给出了一份“你的家务劳动有多少价值”的报告。平均来说，家庭主妇的家务劳动价值换算成年薪竟高达276万日元。当然，如果有新生儿或需要密切看护的老人，其评估额度还会上升。

“一个孤立无援的女性背负了所有的照护负担，我将这种现象称为‘超载的舟舟’。现代家庭从扬帆启航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触礁的命运。”上野认为，为改变现状，必须建立国家、市场、市民社会、家庭共同分摊照护责任的福利多元社会。在这一点上，世界上多数国家都任重而道远。

当然，也有让人欣慰的地方。最近很热门的日剧《逃避虽可耻但有用》，讲的是不擅长做家务的公司职员津崎平匡请了有硕士文凭却找不到工作的实栗给自己做家政。某个时期，平匡的公司经营不好，他可能无法向实栗支付家政费用。于是平匡想了个绝妙的主意，要跟实栗结婚。只要结了婚，以后就再也不用出家政费了。对此，实栗毫不客气地拒绝道：“爱情是一种压榨。”家庭主妇们曾经的“无理取闹”，如今已经变成了常识。

事业还是家庭？

女性追求平等的百年旅程



《事业还是家庭？》
[美]克劳迪娅·戈尔丁著 颜进宇译
中信出版社



《看不见的女人》
[英]安·奥克利著 汪丽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不被看见的情绪劳动》
[美]杰玛·哈特莉著 洪慧芳译
新星出版社



《无薪主妇》
[日]上野千鹤子著 吕灵芝译
北京联合出版社